

出國報告（出國類別：學術會議）

## 史記與人文精神研討會

服務機關：嘉義大學

姓名職稱：蔡忠道(教授)

派赴國家：大陸

出國期間：104.10.23-104.10.30

報告日期：105.01.31

## 摘要

本次出國是應中國史記研究會邀請，參加在陝西渭南師範學院舉辦的「史記與人文精神學術研討會」，這是目前研究史記海內外學者最具規模的聚會，主要是透由定期的學術交流，開展學術視野。這次會議在大陸陝西省渭南市舉行，來自日本、臺灣、大陸的學者近百人參加，研討非常熱烈，讓我掌握最新的研究成果、趨勢，也透由會議期間，與世界各地的史記研究者交流，收穫良多。

# 目次

一、目的.....	1
二、過程.....	1
三、心得及建議事項.....	2
四、附錄.....	4

## 一、 目的

本次出國是應中國史記研究會邀請，參加「史記與人文精神研討會」，這是針對史記研究現況與展望的學術盛會，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會議的舉辦，凝聚學界共識，展望新的研究方向。我則透過會議，了解史記研究的最新成果、趨勢，也督促自己定期發表相關的論文，強化自己的研究智能。

## 二、 過程

本次研討會在陝西省渭南市，由渭南師範學院主辦，海內外學者將近 100 人與會，發表論文超過 60 篇

研討會共舉行兩天：10 月 24-25 日研討會，26 日文化參訪。

本屆研討會是「中國史記研究會」的年會，配合主辦地渭南是中原古城，因此，除了《史記》的研究論文之外，還有陝西、渭南等中原文化與《史記》的相關論文發表。研討會採大會、分組研討的方式交錯進行。

大會研討由海內外資深學者擔綱，包括臺灣大學李偉泰教授、韓國李鐘鉉教授、大陸陝西師大張新科教授、北京師範大學韓兆琦教授等發表史記最新的研究趨勢與成果。《史記研究》期刊即將出版，是今年會議的焦點，張大可教授在會議上強力邀稿，預約著《史記》研究邁入新的里程碑。

分組討論則由其他學者發表論文，每組約二十位，每人發表十分鐘，再討論回應。臺灣的學者，包括清華大學、臺灣大學、嘉義大學、馬偕醫護專科學校被安排在同一場次，討論過程非常熱烈，也常有精彩的辯難交鋒。臺灣學者的論文議題多元、論證豐富，受到與會學者的肯定。臺灣大學的幾位研究生，雖是初生之犢，卻能展現大將之風，贏得相當多的掌聲。大陸學者的論文都比較輕薄，然而，幾位專注在《史記》研究多年的學者，例如陝西師大趙望秦教授都有令人驚豔的研究成果。我發表的論文：〈臺灣《史

記》詮釋初探(1949-2013)》，發表後獲與會學者肯定，也期待我能針對臺灣《史記》學的研究梗深入而全面的爬梳。

文化參訪主要是參訪渭南市的文化景點，包括黃河河套、居庸關，最難得的是大家到陝西韓城司馬遷祠祭拜司馬遷，在寒風細雨中，以莊嚴簡單的儀式祭拜中國史聖，讓人感受到濃重的文化傳承，登上高處的司馬遷墓，徘徊良久，文化的積澱與《史記》的深邃並未隨著時間消逝而淡化，史公的精神依然活躍在現代學者心中，薪火不息。

參訪過程中，看到大陸在文化持續不斷的大規模投資，遠非臺灣所能及；然而，大陸的文化投資流於硬體、表面化。臺灣的規模或許不大，然而，文化深度、精緻度都還可以和大陸競爭，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。

針對《史記》的相關研究，做更全面而深入的探討。

文化參訪主要是參訪中國傳媒大學校內的博物館，因行程緊湊，僅能略略觀覽。一方面看到中國傳媒大學在文化史料保存的用心，希望開創文化觀光的企圖心；一方面也看到大陸的文化投資流於硬體、表面化。臺灣的規模或許不大，然而，文化深度、精緻度都還可以和大陸競爭，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。

### 三、心得及建議事項

這幾年到大陸參加研討會，看到對岸學者、政府與民間文史工作者都非常投入文化的保存與研究，並累積了相當精彩的成果，我覺得他們做對了幾件事，首先，行政資源對學術文化的投資不遺餘力；再者，學者勤奮著述，最後，努力保存文化景點。這些工作，臺灣有做了不少，有些比大陸出色，然而，人力、資源的投入挹注遠遠不及對岸，於是，臺灣在學術的研究上，個人仍具有競爭力，整體就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了。在史記研究上，渭南師範學院的規模不大，卻能全院教師群策群力，經過幾年的努力，有了明顯的成績；全校動員接待學者，展現出團結一心的熱情，也是讓人非常感動。



開幕式



研討會

## 四、附錄

# 臺灣《史記》詮釋初探(1949-2013)

蔡忠道

嘉義大學中文系教授

### 摘要

《史記》的教學與研究在海峽兩岸，甚至日、韓、美、歐等國都有非常多的學者投入，也獲得相當的成果。世紀之交，學者回顧百年的成果，總結以往的成績，展望新世紀的方向，別具意義。《史記》研究的總結工作，在大陸、日本、韓國，甚至歐美的學者都寫了相關的評論。臺灣學界雖然也有文章回顧臺灣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，然而，都流於片段。因此，截至目前為止，臺灣學界針對 1949 年以來，臺灣《史記》全面的回顧與整理仍付之闕如。本論文以「臺灣《史記》詮釋初探」為題，就是希望整理 1949 年至 2013 年，超過 60 年臺灣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，補足這樣的缺漏。筆者以專書、期刊論文、學位論文等三方面蒐集相關研究成果，初步建立論述目錄之後，再徵詢學界前輩提供高見，並且多方主動尋訪補正，以期資料完整可信。接著，筆者根據蒐集的文獻，以十年為斷限，概觀出版數量的消長，並以文學、思想、史學、語言(含考據)等四類，將論述資料分類。在這樣信而可徵的資料基礎上，再進一步分析臺灣超過 60 年史記學的成果。這樣的研究，一方面彙整前人已有的成果，彰顯其特色，讓臺灣的《史記》研究可以和國際漢學對話；一方面也可以找到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特出處，並思考未來研究的方向。

關鍵詞：史記 史記學 臺灣 國際漢學

## 一、前言

臺灣《史記》的教學與研究在文、史學界非常盛行，中文系多會開設《史記》的課程，歷史系或開設《史記》，或者秦漢史的課程也會涉獵《史記》的內容。所以，臺灣文、史科系的學生多有閱讀《史記》專書的經驗。早期，臺灣大學的大學國文，上下學期分別是《史記》與《孟子》，學生普遍閱讀《史記》，台大的教師投入《史記》的教學、研究者涵蓋中文系與歷史系，陣容堅強而壯大，阮芝生、李偉泰、呂世浩都是其中翹楚；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《史記》研究，有賴明德、林初乾等師長持續耕耘；此外，清華大學的林聰舜教授、成功大學的張高評教授、東海大學吳福助教授、高雄師大周虎林教授也長期投入《史記》教研工作，深化研究，培育人才。近年來，拜網路之賜，課程的改革與嘗試推陳出新，台大 MOOC 課程中，由歷史系呂世浩教授開設的《史記》，每期的選修人數都超過萬人，選修的學生除臺灣之外，還有中國大陸、美國等地，令人嘆為觀止，也證明了臺灣《史記》教研的深厚實力。更有甚者，臺灣的中學教科書，也選錄《史記》的篇章，國中國文有

〈張釋之執法〉，高中則有〈鴻門宴〉，《史記》是臺灣學生的共同記憶。<sup>1</sup>因此，《史記》在臺灣的傳播相當普遍，《史記》的學術研究在臺灣也相當盛行。<sup>2</sup>

近來，中國學界的《史記》研究人才輩出，陝西省的「司馬遷研究會」、北京的「中國史記研究會」是兩個頗具規模的史記研究協會，除了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之外，並完成《史記研究集成》、修訂點校本《史記》等重要的學術工作。<sup>3</sup>世紀之交，許多學者對於《史記》研究做了不同面向的總結，例如張大可在《史記教程》第一章〈導論〉，提到《史記》研究的總成果，他統計 1980-1998，不到 20 年的時間，大陸地區發表了 1835 篇論文(總字數 1100 萬字，每位作者 1.6 篇)，131 部專書(總字數 5000 萬字，每位作者 1.3 部)，成果豐碩。<sup>4</sup>這幾年還出版了《史記研究年鑑》，定期總結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，整體而言，大陸近年來《史記》研究的人才輩出，活力充沛。

除了大陸，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歐洲對於《史記》也有相當多的成果。日本池田英雄〈從著作看日本先哲的《史記》研究—古今傳承 1300 年間的變遷〉<sup>5</sup>、《史記學 50 年一日、中「史記」研究の動向(1945-95 年)》、韓國諸海星〈六十年來韓國《史記》研究綜述—1984-2007〉<sup>6</sup>、捷克羅然(Olga Lomova)〈二十一世紀初翻譯史記的回顧與啟發：兼介紹史記翻譯成捷克文的研究項目〉<sup>7</sup>，都是非常具代表性的總結。羅然教授是布拉格查理士大學教授，他的文章著重在《史記》的翻譯，尤其是歐陸的翻譯，他指出，歐陸的學者翻譯《史記》有兩個主要的方向：歷史史料與文學作品。前者著重客觀的考訂，後者著重敘事結構。俄羅斯 Rudolf V. Vitakin 博士率領的團隊已經翻譯了《史記》第 1-100 卷，並全數出版，此外，文章中也介紹了他自己正在著手的《史記》捷克文的翻譯工作。

---

<sup>1</sup> 關於臺灣中國國文課本收錄《史記》篇章的研究，請參見拙著〈臺灣中學國語文教材選用《史記》之研析〉，收錄在臺灣師範學國文系主編《國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的多元探討》，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12.02，頁 147-163。

<sup>2</sup> 筆者初步蒐集臺灣關於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，專書 163 本、學位論文 134 篇、期刊論文(含專書論文、會議論文集)1180 篇。若以 60 年計算，平均每十年都有超過 25 本專書、199 篇期刊論文、20 篇學位論文發表，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。

<sup>3</sup> 張大可、安平秋主導的《史記研究集成》大部叢書，從 1994 開始啟動，經歷 10 年，到 2003 大致完成，2005 由北京：華文出版社出版，一套 14 卷，包括《史記》的內容、流傳、研究等面向，內容將近 500 萬字，是一部企圖宏大，據開創性的學術叢書。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《史記》，流傳甚廣，有相當的嚴謹性，也存在一些問題。南京師範大學趙生群率領一群學者，以新發現的版本、出土資料重新勘校，2014 年，北京的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《史記》的修訂本。大陸學者袁傳璋在 2013 年中國史記研究會的年會上指出，點校本《史記》的重新勘校與出版，是《史記》研究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。

<sup>4</sup> 其他如張新科、俞樺章合著的《史記研究史略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90；張新科、俞樺華等著：《史記研究史及史記研究家》(《史記研究集成》第十三卷)；俞樺華、鄧瑞全主編：《史記論著提要與論文索引》(《史記研究集成》第十四卷)，在總結《史記》研究成績之時，雖涉略臺灣的成果，然而，因時空隔閡，資料並不全面。

<sup>5</sup> 參見〔日〕池田英雄著，張新科、朱曉琳譯：〈從著作看日本先哲的《史記》研究—古今傳承 1300 年間的變遷〉，收在張新科：《史記學概論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，頁 377-403。此外，池田英雄：《史記學 50 年一日、中「史記」研究の動向(1945-95 年)》，東京：明德出版社，1995。

<sup>6</sup> 收在李紀祥主編：《史記學與世界漢學》，台北：唐山出版社，2011，頁 117-142。諸海星另有一文〈《史記》在韓國的流傳與影響—以翻譯介紹與研究現狀為中心〉，漢學研究通訊 23:4，2004.11，頁 11-20。兩篇文章相互參看，對於韓國的《史記》研究歷史與現況就能初步了解。

<sup>7</sup> 收在李紀祥主編：《史記學與世界漢學》，台北：唐山出版社，2011，頁 351-357。

<sup>8</sup>諸海星教授任職韓國啟明大學中文系，他的文章總結韓國的《史記》研究，諸海星教授推斷，《史記》傳入韓國應該不會晚於中國的東晉時期，即韓國的高句麗朝。《史記》全本 130 卷的韓文翻譯，也由成均館大學丁範鎮教授率領的團隊，在 20 世紀末完成並出版。韓國《史記》研究則由留學臺灣的李寅浩、朴宰雨等人為首，逐漸深化，在文學、與研方面有傑出的成果，此外，諸教授也指出韓國《史記》的未來方向，包括《史記》全書的詳注、《史記》接受史、中韓比較研究等。池田英雄是日本《史記》研究名家，他的《史記學 50 年》總結中、日的《史記》研究，分別從《史記》的成立、版本、人物傳記、普及、司馬遷的生卒年、思想等面向歸結相關的研究成果，以及遺留的問題，還專章介紹了《史記》研究的 50 年軌跡、《史記》研究的最新動向，非常全面的總結了中、日 50 年(1945-1995)的研究成果，令人嘆賞。

臺灣學界對於《史記》研究的成果也有多次的總結。民國六十年，學界編撰《六十年來之國學》書系，其中，《史記》專章由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劉本棟教授負責撰寫，在其〈六十年來的《史記》〉一文中，劉教授針對 1921-1972 年間，選擇十二本代表性的專著，作了簡略的介紹，<sup>9</sup>以鳥瞰的方式總結 1921-1972 年的研究成果。

1993 年，趙秀金等人以集體合作的方式，回顧了臺灣三十年(1963-1993) 的《史記》研究成果<sup>10</sup>，他們蒐集了 19 本專書、48 篇期刊論文，指出《史記》研究在三個面向有顯著的成績：《史記》的考證注疏、《史記》內容及體制義例研究、司馬遷思想研究。

此外，王民信《史記研究之資料與論文索引》<sup>11</sup>，也蒐集了有關《史記》版本、解題，以及相關研究的資料與論文，包括古今以及香港、大陸的資料都盡量蒐集，對於初入門的研究者頗有助益。

以上三者都試圖在自己的時間點上，整理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，然而，限於時間、材料，劉本棟、趙秀金都是以鳥瞰的方式，約略的觀察；王信民的蒐集比較完整，古今中外都包括的範圍又太大了。除了針對研究成果的整理，也有臺灣學者選錄《史記》研究的代表性論文，輯為一書，提供研究者必讀篇目，嘉惠學子。<sup>12</sup>這樣的選輯有學術上的價值，可惜自張高評編選：《史記研究粹編》之後，就無後繼者了。再者，這樣的選編仍有掛一漏萬的遺憾，無法看出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完整面貌。<sup>13</sup>

---

<sup>8</sup> 2011 年 12 月 2-4 日，羅然教授主辦的「《史記》及其超越：第三屆《史記》國際研討會」在布拉格查理士大學舉行，是近年來最重要的《史記》國際研討會，參見呂世浩：〈《史記》及其超越：第三屆《史記》國際研討會紀要〉，《臺大歷史學系學術通訊》第 13 期，2012.10，頁 19-25。

<sup>9</sup> 收錄在程發軔主編：《六十年來之國學》，台北市：正中書局，1977。十二本書包括：《史記新校注》、《史記今註》、《史記輯證》、《史記今釋》、《史記天官書今註》、《史記儒林列傳疏證》、《史記地名考》、《史記舊注平義》、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、《史記探源》、《太史公書義法》、《史記考索》。

<sup>10</sup> 參見趙秀金等〈近三十年來臺灣地區有關司馬遷史學之研究〉，《史苑》第 54 期，1993.05，頁 1-13。《史苑》是輔大歷史學會發行的刊物，作者應是輔大歷史系的學生。

<sup>11</sup> 該書由台北市：學海出版社，1976 年出版。

<sup>12</sup> 據筆者所見，在臺灣地區這類的書有：大陸雜誌社編：《史記考證研究論集》，台北市：大陸雜誌社，1970。森海出版社編：《史記研究論文集》，台北市：森海出版社，1973。潘重規等：《史記論文集》，台北市：木鐸出版社，1976。陳新雄、于大成主編，《史記論文集》，國學論文叢編第一輯第二冊，台北市：西南書局，1978。黃沛榮：《史記論文選集》，台北市：長安出版社，1982。張高評編選：《史記研究粹編》，高雄市：復文書局，1992。

<sup>13</sup> 李偉泰〈近十餘年來之《史記》研究（2001~2012）〉，針對十年來臺灣的《史記》研究成果，詳細介紹，經請教李教授，這是「先秦兩漢學術—研究生講習會」的講稿，沒有正式發表。不過，李教授特別

綜上所述，世紀之交，學界對於百年的學術反省全面展開，《史記》的研究亦難置身事外。大陸在這方面最積極，也成果豐碩。日本、韓國、歐洲都有相關的省思與成果。臺灣的《史記》教學、研究都非常興盛，卻沒有對《史記》的研究作全面的整理，因此，筆者遂不揣淺陋，自動請纓，希望能整理 1949 年至今，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成果。一方面掌握已有的成績，一方面也試著指出未來的方向，我想這兩點對於臺灣《史記》研究來說，都至為重要。

本論文希望總結自 1949 年至今，臺灣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。有幾點問題必須先釐清，首先，研究斷限的問題，本計畫以 1949 年為起點，是因為 1949 年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，開啟了兩岸分治的時代，為了彰顯臺灣《史記》的研究，尤其是與大陸區別的成果及特色，1949 年以後最為顯著。下限則是筆者所能搜尋的完整資料，因此設定至 2013 年，超過 60 年的時間。

## 二、專書

如前所述，本研究希望總結 1949 年迄今臺灣《史記》的研究成果，筆者初步以專書、期刊論文、學位論文等三方面蒐集相關研究成果，這是學界撰寫論文時參考書目的架構，也是蒐集資料比較完整的架構。初步建立論述目錄之後，筆者以十年為限，作數量的統計，概觀出版數量的消長；並以文學、思想、史學、語言(含考據)等四類，將論述資料分類。

資料的蒐集工作是本論文的關鍵，筆者先利用國家圖書館等相關的網站，搜尋相關的資料，建立目錄，並請益前輩學者提供意見，修正補充。接著，把視野擴及專書論文及會議論文，這部分就比較棘手，以會議論文及為例，包括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的《史記》國際學術研討會、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漢代思想與文學學術研討會、佛光大學文學院主辦的《史記》與國際漢國際學術研討會等，蒐集的資料以正式出版會後論文集為主。此外，經李偉泰、林聰舜兩位教授提醒，又補充了臺灣學者在大陸研討會、期刊發表的論文。不過，資料的蒐集終究不能毫無遺漏，筆者會不斷的修正、補充，也會持續向學界前輩請益，希望能盡量避免缺漏，建立完整的資料檔案。

資料初步蒐集建立之後，筆者將閱讀相關資料並摘要其內容，這部分的工作量相當大，筆者會先篩選重要的論著，閱讀並摘要，筆者希望能先著手最新、最具代表性的論著，所謂最新，比較沒有爭議；具代表性就比較有爭議，不過，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愈多人做越好，爭議只是個人選擇的學術視角，較無關乎整體計畫成敗的關鍵。

最後，筆者希望在這樣的總結基礎上，指出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方向，這個部分還要參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《史記》研究成果與最新研究方向，大陸張大可、張新科，以及韓國諸海星都有很精要的論述，可以作為重要的參考。池田英雄《史記學 50 年》的架構，教則是筆者可以多年努力的理想。筆者初步建立的資料，會再進一步交叉比對、蒐羅補正，並請教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前輩學者，包括賴明

---

注意到臺灣學者在大陸期刊或研討會發表的論文，這對筆者彙整期刊論文的資料，非常有幫助。

德教授、蔡信發教授、李偉泰教授、林聰舜教授、吳福助教授、張高評教授、李紀祥教授等人，請他們提供寶貴意見，彙整成為可信有徵的資料，在這個基礎上，開展相關研究成果的整理、歸納與分析。

以下先就專書的資料說明如下：

1949 年之後，臺灣《史記》的專書包括古籍的出版與學者的專著兩部分。在古籍的出版這部分，除非是重要版本或校注本，本論文對於重複出版的古籍版本就不予蒐錄，因此，本論文將以學者專著為主。筆者初步蒐集到的專書超過 160 本，主要的內容包括學術研究與選集新譯。<sup>14</sup>目前，筆者初步建立從 1949-2013 的《史記》相關專書的檔案，其中，學術著作，包括編纂的論文集，約佔三分之一，其餘超過三分之二都是通俗傾向的著作，包括白話改寫、今註今譯、節選本等。就十年的出版數量而言，2001-2010 出版超過 40 本專書最多，最少是 1969 年以前的 10 本。

在學術著作方面，內容多元而精彩：

專題論文部分，例如劉偉民：《司馬遷研究》(台北市：景文書局，1985)、賴明德：《司馬遷的學術思想》(台北市：洪氏出版社，1980)、周虎林：《司馬遷與其史學》(台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0)，針對司馬遷的生平、思想、史學，作宏觀的考察；古國順：《史記述尚書研究》(台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)則是闡發《史記》在經學史，尤其是尚書學史的意義。吳福助：《史漢關係》(台北市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7)則是專注於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的比較，吳福助另有《史記解題》(台北市：河洛圖書出版社，1979)，針對《史記》一百三十篇的主題內涵、寫作技巧與研閱方法，都有提綱挈領的提點，有助於初學者。汪惠敏：《史記政治人物述評》(台北市：師大書苑，1991)，特別聚焦在《史記》政治人物，是臺灣研究《史記》類型人物的第一本專書。蔡信發：《話說史記：歷史興衰勝負的癥結》(台北市：萬卷樓出版社，1995)，蔡信發教授在《史記》研究上深有所得，《話說史記》是蔡教授多年研究的成果。他在《史記》體例的見解、篇章的細膩分析，都是筆者閱讀、研究《史記》的重要參考。鄭圓玲：《史記黃老思想研究》(新北市：學海出版社，1998)，特別對《史記》的黃老思想深入闡發，〈太史公自序〉的〈論六家要旨〉是漢代黃老思想的重要文獻，然而，司馬遷的思想有其複雜性，除了承繼父親的黃老之外，也尊崇孔子，對於法家也有同情的理解、公允的評論。因此，司馬遷創作的《史記》，其思想內涵也非常豐富，鄭圓玲選題相當有眼光，也獲得相當成果。林聰舜：《史記的人物世界》(台北市：三民書局，2003)、《史記的世界：人性與理念的競逐》(台北市：國立編譯館，2009)是兩本深入有得的《史記》專著，林聰舜教授任教於清華大學，長期投入漢代學術研究，對於《史記》深入有得，能發人所未發，例如，以世界觀詮釋韓信敗亡即是一例，發人深省。李紀祥：《史記五論》(台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)，李教授任教佛光大學歷史系，長期投入中國史學研究，這本專書是他對《史記》的部分研究成果，內容涵蓋史學、文學。此外，李教授也舉辦了兩屆「世界漢學中的《史記》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試圖將《史記》的研究推向國際，並與國際漢學對話。由其主編的《史記學與世界漢學論集》(台北市：唐山出版社，2011)是部分

<sup>14</sup> 參見附錄一《史記研究專書一覽表》。這是筆者初步的蒐錄，尚有缺漏之處，待候續補訂。不過，也可以初步觀察研究成果。以下附錄二亦同。

成果的結集。呂世浩：《從五體篇末看史記的特質：以〈平準〉、〈三王〉、〈今上〉三篇為主》(新北市：花木蘭出版社，2008)、《從史記到漢書：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》(台北市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9)，呂世浩教授任職台大歷史系，他的這兩本專書都是從史學編纂的角度開掘《史記》的內涵，前者以《史記》五體的末篇，尤其是本紀、世家、書為考察重點，後者則關注《史記》到《漢書》的轉折與變化。

考訂的成果也是成果豐碩，例如，施之勉：《史記會注考證訂補》(台北市：華岡出版社，1976)，針對日人瀧川龜太郎《史記會注考證》的資料，細緻的考訂與增補。瀧川龜太郎《史記會注考證》的成就大，影響深，然而，訛謬也不少，施之勉教授的工作非常有價值，魯實先教授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(台北市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)也是相似的著作。王叔岷：《史記斟證》(台北市：中研院史語所，1982)則是《史記》校讎工作的最重要總結。

論文集的出版也是專書中的亮點，包括研討會論文集，例如輔大中文系主編：《紀實與浪漫：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(台北市：洪葉文化，2002)、李紀祥主編：《史記學與世界漢學論集》(台北市：唐山出版社，2011)。還有《史記》的論文集，例如潘重規等：《史記論文集》(台北市：木鐸出版社，1976)、陳新雄、于大成主編：《史記論文集》(台北市：西南書局，1978)、黃沛榮主編：《史記論文選集》(台北市：長安出版社，1982)、張高評：《史記研究粹編》(高雄市：復文書局，1992)。論文集的出版對於退動《史記》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。

在古籍選注、語譯、改寫等普及《史記》的著作方面，也有可觀的成績。古籍選注部分，馬持盈：《史記今註》(台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 初版，2006 再版)，是臺灣第一部《史記》全本今註今譯的專書，至於《白話史記》的《史記》語譯工作，也有蘭臺書局(1969)、河洛出版社(1979)等積極投入，或者馮作民獨立完成(1978)，不過，最具影響力的仍是由臺大、臺灣師大等校教授合力完成的《白話史記》(台北市：聯經出版社，1985)。至於大學《史記》課程的授課教材，早期都是採用瀧川龜太郎的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近來，因授課時數縮限等因素，《史記》選本逐漸被列為教材，例如臺大李偉泰教授等人編選的《史記選讀》(台北市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8)。《史記》改寫的部分，李永熾：《歷史的長城：史記》(台北市：時報文化，1981)最具代表性。李永熾教授任職台大歷史系，他以深入淺出的文筆改寫《史記》故事，生動有趣，引人入勝。

此外，黃啟芳、洪國樑：《史記地圖匯編》(新北市：學海出版社，2001)是第一本比較完整的《史記》地圖專著，研閱《史記》必須配合地圖，然而，不論掌握古今地名的變動，戰爭描寫與兵法運用等，都需要明晰的地圖資料，黃啟芳、洪國樑兩位教授的《史記地圖匯編》補足了這方面的不足。不過，受限於繪製技術與出版經費，該書以手繪的方式出版，不夠精確明晰，授課時的運用也比較受限。

大陸學者《史記》研究著作在臺灣出版，則是另一個值得觀察的焦點。從楊燕起等：《歷代名家評史記》(台北市：博遠出版有限公司，1990)開始，陸續有何世華《史記美學論》(台北市：水牛出版社，1992)、韓兆琦《史記選注匯評》(台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1993)、《史記博議》(台北市：文津出版社，1995)、陳桐生《儒家經傳文化與史記》(台

北市：洪業文化出版社，2002)等著作在台出版，這標誌了兩岸《史記》研究的實質交流。

### 三、學位論文

筆者初步蒐集臺灣從 1949-2013《史記》研究的學位論文，總共 134 篇。其中博士論文 15 篇，約占 11%，碩士論文 119 篇，約 89%。學位論文的系所的部分，中文系(包括國文系、語教系)118 篇，佔 88%。其他的系所 16 篇，佔 12%，包括歷史系有 9 篇，教育系 2 篇，東亞系 1 篇，東方人文思想所 1 篇，地理系 1 篇，宗教系 1 篇，應用外語系 1 篇。如果就研究主題而言，據筆者初步歸納，文學 61 篇，約 46%、思想 39 篇，約 29%、史學 21 篇，約 15%、語言 13 篇，約 10%。

如果從 1950 年開始，以 10 年為期的數量統計，每 10 年平均約有 27 篇。然而，第一篇出現在 1965 年，譚固賢：《史記尚書說》(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)，因此，1950-1959 年沒有學位論文。統計從 1960 年開始，細究其論文數量的分布，1961-1970 有 5 篇，都是碩士論文；1971-1980 有 5 篇，1961-1970 有 5 篇，有 2 篇博士論文、3 篇碩士論文，較諸前 10 年，數量並沒有增加，不過，出現了兩篇博士論文，包括臺灣第一篇《史記》博士論文：阮芝生《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》(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73)，阮芝生先生後來留在台大歷史系任教，成為臺灣研究《史記》的代表性學者之一。另外一篇博士論文，許璧《史記稱代詞語虛詞研究》(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75)，這是第一篇中文系博士論文。碩士論文中，朴宰雨：《史記的寫作技巧研究》，(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，1980)，朴宰雨是韓國學生，碩士之後，繼續在臺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，返回韓國之後，成為韓國研究《史記》的代表性學者之一。

1981-1990 有 11 篇，包括 3 篇博士論文，8 篇碩士論文。博士論文包括張添丁《司馬遷春秋學》、金苑《史記列傳義法研究》以及朴宰雨《史記漢書傳記文比較研究》，內涵包括了經學、文學。碩士論文部分，出現了第一篇地理學的論文：林哲君《司馬遷的地理思想與觀念》，這也是臺灣唯一一篇研究司馬遷地理思想的學位論文。此外，李寅浩、金聖日都是韓國的學生，兩人分別在臺灣、韓國完成博士論文，也成為韓國研究《史記》的重要學者。1991-2000 有 15 篇，包括 4 篇博士論文，11 篇碩士論文。博士論文包括李寅浩《史記文學價值與文章新探》、簡松興《西漢天人思想—以《淮南子》《春秋繁露》《史記》為中心》、魏聰祺《太史公「成一家之言」研究》、高禎燾《史漢論讚之研究》，分別出自臺灣師大、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四個大學的博士論文，標誌著《史記》研究的開枝散葉，研究人才的培育更加深廣。

2001-2010 有 71 篇，包括 6 篇博士論文，65 篇碩士論文。博士論文包括 5 篇中文系、1 篇歷史系，研究主題涵括傳記文學、語言、敘事學、《史記評林》、生死觀以及《史記》到《漢書》的轉折等，非常多元。碩士論文部分，有 2 篇教育系、1 篇宗教系的碩士論文，《史記》受到不同科系的研究生的關注。2011-2013 有 27 篇，全部都是碩士論文。在研究的主題部分，文學 61 篇，佔 45%；思想 39 篇，佔 29%；

史學 21 篇，佔 16%；語言(考證、翻譯)13 篇，佔 10%。以文學研究佔多數，思想研究僅次其後，史學、語言(含考證)又其次。

整體而言，臺灣近六十年來的《史記》學位論文，有幾點項項值得注意：

首先，在 15 篇博士論文中，韓國學生佔了 3 位：朴宰雨、李寅浩、金利湜，比例相當高，這三位韓國學生的碩、博士論文都在臺灣完成，學程返回韓國，都在大學任教，對於韓國《史記》研究的建立與推動，有重要的貢獻，這是中、韓學術交流重要的一頁。

再者，在臺灣的學位論文中，《史記》的研究以中文系為主，也有歷史系、教育系、地理系、宗教系，展現多元的學術專業視野，不過，中文系佔了將近九成，其他系所，尤其是歷史系的比例偏低。在研究主題方面，如果以文學、思想、史學、語言四大領域統計，文學最高，將近一半；其次是思想，將近三成；史學、語言各有一成五及一成。文學佔最高比例本在預期之中，思想研究在臺灣《史記》學位論文將近三成的比例，完全超過筆者的預期。

#### 四、期刊論文

筆者初步建立蒐集臺灣從 1949-2013 有關《史記》的單篇論文，總共 1180 篇。除了期刊論文，筆者也蒐集專書論文、正式出版的會議論文集，包括政治大學中文系主辦的「漢代文學與學術思想研討會」、輔大中文系舉辦的「史記國際研討會」、佛光大學文學院主辦的「世界漢學中的史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等。此外，近年來海峽兩岸學術交流頻繁，臺灣學者在大陸期刊發表論文，或者會議論文集也收錄臺灣學者的論文，這部分也盡量蒐集。整體而言，如果從 1950 年開始，以 10 年為期的數量統計，每 10 年平均約有 199 篇左右。1981 年-1990 年最多，有 329 篇，其次，2001 年-2010 年，共 266 篇；1971 年-1980 年，計 238 篇；1991-2000 年，則有 185 篇、1961 年-1970 年，計 82 篇；1951 年-1960 年，計 6 篇。2011 年-2013 年，計 79 篇。1951-1960 的單篇論文數量最少，後來逐年增加，到了 1991-2000 達到高峰，2000 年之後，論文數量雖有減少，仍高於 1971-1980 十年的論文數量，因此，我們可以從《史記》單篇論文發表的數量消長，初步推論：近 60 年的臺灣《史記》研究，從 1960 年第一篇論文發表之後，逐步成長。到了 80、90 年代達到高峰，並持續不斷，直到現代，每十年都有將近 200 篇的論文發表。因此，臺灣的《史記》研究仍維持相當的研究能量。

此外，隨著國際學術交流風氣的開展，臺灣學者在國外，尤其是在大陸期刊發表論文也逐漸增加，就《史記》而言，大陸陝西省司馬遷研究會的《司馬遷與論集》、中國史記研究會的《史記論叢》，還有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的《秦漢研究》，都可以看到臺灣學者的文章。

#### 五、結語

國際化是目前學術的重要走向，如果從國際漢學的角度，臺灣的《史記》研究應該放在什麼位置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必須先說明 1949 年之後，超過 60 年，臺灣在《史記》

的研究上，交出了什麼樣的成績單。然後，在把這樣的成果，置放在國際漢學，尤其是《史記》研究的場域，在相互參照、比較之中，發現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精彩殊勝之處，也對照出臺灣《史記》研究待努力的地方。本論文著重臺灣《史記》研究成果的資料建構，主要包括專書、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三部分，筆者雖已經初步整理相關資料，仍待進一步蒐補、校對；就目前所蒐集的資料，以十年為斷限，作初步的分析，分析包括兩部分：數量的消長，以及內容的分類。數量的消長可以觀察研究成果的變化起伏，內容的分析，初步是以文學、思想、史學、語言(含考據)四大類，歸納研究的內容。

臺灣的《史記》研究成果，以期刊與學位論文為主，學位論文以中文系為主，其內容多寡依序是文學、思想、史學、語言。據筆者針對 134 篇學位論文的分析，發現關於《史記》文學議題的研究最多，思想議題的研究也出乎意料，佔得較高比例，反而史學比較少，這樣的資訊對相當有意思，也指出臺灣學界或許可以多開發史學視野的《史記》研究。此外，臺灣的《史記》研究與大陸有密切的來往，不論在期刊發表、專書出版等方面，都有具體可喜的成果；與韓國也建立了相當深厚的連結，然而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交流就比較少，這方面也是可以再努力的地方。

這幾年筆者參與《史記》相關的國際研討會，有一個比較深的體會，臺灣個別學者的研究成績斐然，在研討會上，臺灣學者的研究論文多受矚目，這是非常可喜的。證諸於本論文對於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統計，臺灣《史記》研究仍然維持一定的研究能量。不過，這裡仍有一些潛藏的危機，臺灣《史記》研究近十年來的學位論文中，博士論文有減少的趨勢，這表示在呂世浩、李秋蘭等這一批年輕學者之後，是否有足夠的人才接棒，這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現象。

網路時代，大數據來臨，臺灣《史記》研究的機會在哪裡？呂世浩在 MOOC、COURSERA 的《史記》課程大受歡迎，肯定了臺灣《史記》的重要發聲位置，這方面應該有更多的跟隨者。臺灣《史記》研究者如何在呂世浩的實踐經驗中獲取滋養，強化自身的教學與研究，是即時而重要的課題。此外，臺灣《史記》研究如何結合時代的新興議題，開展可能的新領域，例如《史記》與司馬遷的生死觀、《史記》的敘事研究、《史記》與數位人文的結合等，都是已經開發，而需要深入；或者尚未被重視，而值得發展的視野。當然，這些新嘗試都不能遺忘臺灣學界對於學術自由的尊重，以及在文獻上的紮實功夫。

面對未來的挑戰，筆者對於臺灣《史記》研究仍充滿樂觀的期待。